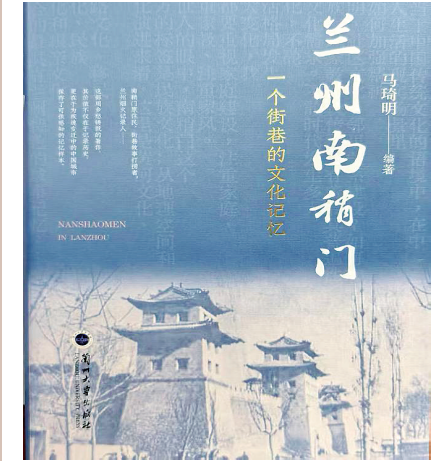


巷陌藏文脉 烟火忆金城

——读《兰州南稍门——一个街巷的文化记忆》有感

●马廉朴



文化是民族的血脉，是人民的精神家园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中文化已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力量。

兰州踞于陆域版图几何中心，以“金城”之固扼守丝路要冲。马琦明先生历时六载，书写《兰州南稍门》一书，以兰州南稍门六百年沧桑为卷，用文字打捞街巷往事、定格市井烟火，既是一部微观的城市街巷史，更是一封写给金城故土的深情家书，为当代人解锁老兰州的文化密码，留存下弥足珍贵的乡愁档案。

全书以文化生态、时代记忆、人物传记、生活故事四大篇章为脉络，跳出宏大

叙事的框架，以原住民的视角切入，将南稍门的历史沿革、民俗风情、街坊日常、乡贤风骨与民族烟火娓娓道来。书中没有晦涩的史料堆砌，只有读书明理的家风、守望相助的多情、正直谦逊的贤者品格、烟火缭绕的市井日常——军政驻守、文人驻足、商贸经营、工匠谋生，多元人群在此交融，织就兰州最鲜活的民间生活图景。这些看似细碎的片段，藏着泥土的芬芳、生活的本真，以小见大折射出南稍门的精神价值，让地域文化不再是陈列馆里的标本，而是流淌在百姓血脉里的活态传承。

本书的格局，是贯通古今的担当。作者以亲历者的赤诚、研究者的严谨，厘清南稍门自明洪武年间至今的历史脉络，填补兰州街巷文化的空白。书中既梳理“联络四域、襟带万里”的地理底蕴，也挖掘“讲仁爱、守诚信、崇正义、尚和合”的价值内核；既记录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温暖日常，也反思现代化进程中社区文化根脉的守护难题。在高楼迭起、烟火渐淡的当下，这本书以文字为锚，守住老街的文化肌理，提醒我们：向前走，更不能忘记走过的路；物质家园愈丰裕，精神港湾愈需坚守。这是一位老者对故土的答卷，更是一代人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担当。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促进各民族美美其美、美美与共的当下，

有着独特的意义。本书的力量，是直抵人心的治愈。在视频、爽文横行的当下，焦虑与迷茫裹挟着每个人，而南稍门的故事给出最朴素的答案：幸福不在虚无的幻想里，而在踏实的追求、烟火的日常、内心的坚守中。书中的街坊们不求富贵，只愿安稳度日，以勤俭立身、以善良待人、以热爱生活，将平凡日子过出滋味与光亮。这种扎根生活的韧性、温润向善的品格，正是当下最稀缺的精神养分。读罢全书，浮躁的心会渐渐沉静，我们终将明白：真正的力量，源于对文化的敬畏、对生活的热爱、对本心的坚守。

街巷会变迁，建筑会更迭，唯有精神与文化跨越时空、代代相传。《兰州南稍门》以一条巷观一座城，以一座城见一个时代，用朴素文字留住兰州的烟火记忆，用赤诚之心传承西北的人文风骨。它是地域文化研究的珍贵样本，是乡愁书写的温情范本，更是一把打开心灵归处的钥匙。

这本书的第一章文化生态中的6个部分，分别为：历史悠久、街巷文化、民族美食、文化基质、家风传承、城市形态、精神文化。不仅是南稍门文化历史渊源和传承的全方位展示，而且对历史街巷文化保护和发展提出了作者的独到见解和思考。这本书，对于每一座正在更新的

城市而言，更是一份启示：留住街巷记忆，便是留住城市的灵魂，守住文脉根脉，方能守住前行的底气。

掩卷沉思，不由人思绪万千。《礼记·学记》云：“叩之以小者则小鸣，叩之以大者则大鸣。”无疑不叩则不鸣。任何地域文化，都需要长期不懈地被书写。书写是一种描述。对进程与现实的不断描述，有助于地域文化性的梳理和主流文化的形成。书写也是对历史与记忆的捍卫。地域文化动感鲜明、魅力无穷的地方，总是书写饱满的地方。马琦明先生通过不倦而又饱满地书写，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守望者。正如著名文化学者冯天瑜在《文化守望》中所说：“认识文化的创造主体，又接受文化的反哺，获得知性与德性，成为万物灵长。创造并受惠于文化的人，理当充任文化的守望者——守护其既有果实，为往圣继绝学；瞭望其前行走势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对于临夏读者来说，本书所写一些人物和故事与临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如：出生于临夏的灯谜大师马啸天、曾任导河县长的马凤图，创办民国新学——清华小学的支持者马安良、马骥、喇世俊等。通过阅读此书，可以了解历史本来面目，拓宽视野增长知识。



点过的怀素是书狂，唐朝凭这三个人，就能平视魏晋，压倒后世。张旭的草书艺术不仅在当时备受赞誉，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的作品传承千年，直到今天，我们仍然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那份激昂、奔放的情感和无与伦比的创造力。

和彭大金交往久了，他的作品看得多了，了解深了，便觉得他的作品有了张旭的味道，这是彭大金的魅力所在。

书法奇才彭大金

文字是符号，是语言的载体，更是文化得以传承和储存的有效方式和工具。不管是古埃及的圣书字、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、古印度文字、美洲的玛雅文还是英文，其功能和中国的汉字没有差别。但是在世界众多的文字演化过程中，汉字不仅保持着文字的功能而且发展成为艺术，那就是书法。

既然是艺术，就要遵循艺术的规律。著名画家黄永玉说：“艺术有一个铁打的基础，都要凭人的智慧和手艺做出来。”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，一智慧，二手艺。换句话说，书法要写得好，不仅靠天赋而且要勤学苦练。世上所有的手艺，不吃苦，不勤练，终归创作不出美的作品。比如说现在的书法家，虽然临摹了许多古人碑帖，甚至痴迷到能感受到古人气息的程度，但是不管吹嘘得多么厉害，拍卖价有多高，终究超越不了古人的书法。这并不是天赋不够，而是环境使然。现在的人写书法，大多怡情悦性。而古人写字，不仅仅是全神贯注而且是用性命来书写。我们知道，古代的翰林院是皇帝的秘书机构，上至翰林学士下至庶吉士。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是起草诏书、管理史册、文翰、考议制度、详正文书、编修实录、玉牒、史志、六曹章奏，换句话说，他们的工作就是天天写字。皇帝的诏书，通俗点说就是文件，下发到地方，放在现在，不过是打印复印的事，可是在古代必须一笔一划地写出来。下发上百个地方，得写上百份，下发上千个地方，就得写上千份，可

见工作量之大，还不得有错字，若诏书写错一个字，便要掉脑袋。怪不得古人的书法，绝少错别字。而现今书法家，偶尔会出现一两个错别字。在我看来，尽量不要写错别字，这是写好书法的最起码的要求。另一个，就是要下功夫，而不是所谓的技巧和设计。

在我认识的书法家中，彭大金是唯一一个没有加入任何一级书协的人，也是唯一一个对书法近乎疯狂的痴迷者。

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目睹他书写时的风采。他站在书案前，眼里隐约地泛起憧憬，垂首悬肘，青黝的脸上那一抹浓密的胡子因为高度专注而神采飞扬。毛笔在他手中，一副枕戈待发的模样。他书写时眼睛从不看人，胸中似乎涌泛着复杂的情绪和无法抑制的激情。他的身体微微缩回又往前移动。指尖触碰到宣纸时，身子泛起奇异的战栗。笔在手中，指头自然变成双钩，掌腕虚平。毛笔看起来平静，却感受到了欲动之势，似乎能量在笔杆内部流动。他每天习书的时间从不会因为任何而改变。他的书架上，除了百来本碑帖，几十本诗话辞典、书法理论和书法史著作，古人诗词集外，占据空间更多的是宣纸、墨、笔筒，还有书法家历年搜集的来自不同朝代的砚台。

大金擅行草，他的案头，总是躺着一轴已经开封的长卷，随展随写随裁。他的笔头濡墨那一刻，也是他最开心的时候，笔头触到白如蚕茧的纸上，逆入，下切，回锋，翻转，下压，上提，平移。此

叶间藏画意 乡土育童心

——记临夏县黄泥湾镇程家川中心小学树叶贴画特色美术课堂

●马雪莲  安晓玲

秋风掠过乡村的田野与校园，吹落了满树斑斓。在临夏县黄泥湾镇程家川中心小学的美术教室里，一场与落叶的邂逅正悄然上演。树叶贴画，这门取材于乡土、扎根于自然的特色课程，正成为乡村小学美术教育的一张亮丽名片，让孩子们在指尖翻飞间，触摸艺术的温度，感受乡土的诗意。

相较于城市小学，乡村小学常常面临美术材料匮乏的难题。画笔、颜料、彩纸等美术用品，对部分乡村孩子来说不算昂贵，却也少了几分唾手可得之便利。为此，乡村小学的美术课堂或许少了琳琅满目的专业材料，却坐拥得天独厚的自然宝库——落叶，这是大自然赠予乡村孩子最慷慨的礼物。每到秋高气爽时节，美术老师便会带着孩子们走进校园的小树林，漫步在乡间小路上，开启一场“树叶寻宝”之旅。孩子们踮着脚尖采摘银杏叶，蹲在地上捡拾枫树叶及形状奇特的梧桐叶，欢声笑语回荡在田野间。这个收集树叶的过程，本身就是一堂生动的自然观察课。孩子们发现，银

杏叶像一把小巧的扇子，枫叶的边缘有锯齿状纹路，不同的树叶有着不一样的色彩和肌理。这份对自然的细致观察，是美术创作的第一步。校园里的银杏叶、梧桐叶、枫叶和田埂边的狗尾草、蒲公英、车前子，都是孩子们信手拈来的创作素材。每节树叶贴画课的前奏，都是一场充满野趣的“自然寻宝”。孩子们将这些“宝贝”夹进课本压平，仿佛收藏起整个秋天的美好。

走进程家川中心小学美术课堂，一张张课桌上铺满了形态各异的叶片，黄绿相间的梧桐叶、火红的枫叶、细长的柳叶、圆润的榆树叶，搭配着狗尾草的绒绒穗子、蒲公英的白色冠毛，俨然一个微型的自然博物馆。孩子们围坐在一起，在美术老师引导下观察树叶的形状：“这片椭圆形的树叶，像不像小鸭子的身体？”“那片细长的柳叶，能不能当作小鱼的尾巴？”老师不会设定刻板“标准答案”，而是引导孩子们展开想象：“这片扇形的银杏叶，像不像蝴蝶的翅膀？”“那片锯齿边的榆树叶，能不能做小刺猬的背？”孩

子们的创意火花瞬间被点燃，纷纷化身“小小艺术家”。

有的孩子用梧桐叶做屋顶，用椭圆形形的树叶做墙壁，再用细草茎勾勒出篱笆，一幅“农家小院”图跃然纸上；有的孩子将枫叶剪成花瓣，用狗尾草作花茎，拼出一束生机勃勃的“秋日花束”；还有的孩子脑洞大开，用柳叶做小鱼的尾巴，用圆叶做鱼身，点缀几颗野果当气泡，勾勒出灵动的池塘小景。创作树叶贴画的过程，是孩子们与自然对话的过程。他们根据叶片的天然形态巧加利用，在修剪、拼贴、点缀中，锻炼着手部精细动作，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想象力得到了充分释放，也培养了审美与创造力。

这门特色课程的魅力，远不止于一幅幅精美的植物贴画。老师会借着课堂，向孩子们传递环保理念：“我们捡拾的是自然脱落的树叶，不能攀折树枝，要做大自然的守护者。”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懂得了珍惜草木、敬畏自然。课后，孩子们的作品会被装点在教学的文化墙，

或是送给村里的老人，这些充满乡土气息的艺术品，成了校园最美的风景线，也成了连接校园与乡村的情感纽带。

树叶贴画，让乡村小学的美术课堂挣脱了材料的束缚，扎根于乡野沃土。它用最朴素的方式，让艺术走进了每个孩子的生活，让孩子们明白：艺术不必远求，美就在脚下，在指尖的落叶里。

乡村的秋天，是被落叶染成的童话。金黄的银杏叶、火红的枫叶、细长的柳叶……这些散落在田间地头、校园角落的落叶，在乡村小学的美术课堂上，摇身一变，成了孩子们手中的“艺术法宝”。树叶贴画这一充满自然气息的美术活动，正悄然丰富着乡村小学的美术课堂，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创意世界的大门。

一叶一世界，一贴一童心。树叶贴画，让乡村小学的美术课堂告别了单调与枯燥，变得鲜活而生动。它用最朴素的材料，给孩子们带来了最纯粹的艺术快乐，也让乡村孩子在大自然的怀抱里，尽情绽放创意的光芒。

明清两代，河州地区曾活跃着一批特殊的族群，他们既不是普通的牧民，也不是纯粹的商人，而是承担着向朝廷“纳马换茶”重任的番族。朝廷管他们叫“中马番族”或“招茶中马番族”。三百多年间，这些番族的数量从明初的五十多族，逐渐缩减到明末的二十九族，再到清初仅存的十九族，最终随着“改土归流”消失在历史长河中。

一、明朝为什么要在河州实行“以茶换马”政策？

故事得从公元1368年说起。那一年，朱元璋在南京称帝，明朝正式建立。可天下并没有就此太平，西北边疆局势复杂，残元势力仍在北方虎视眈眈。到了洪武三年，也就是1370年，明朝已经站稳了脚跟，开始着手解决西北的问题。这一年，明朝大将邓愈带兵来到河州， he 先是派人去劝说当地的藏族部落和元朝守军投降。很快，元朝在河州的官员带领部下归顺了明朝，河州一带正式纳入了明朝的版图。

不过，河州虽然归顺了，但周边还散布着很多藏族、蒙古族部落。粗略一数，光叫得上名字的番族就有近百个。河州正好处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，西边连着西藏、青海，东边挨着中原，是通往青海、四川、西藏的交通要道，地理位置十分特殊。

在明朝看来，河州一带既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缓冲地带，也是控制西藏、青海的前哨阵地。朝廷最担心的是：这些当地的番族会不会和逃到北方的北元蒙古势力联合起来？如果真是那样，西北边境就永无宁日了。为了分散他们的力量，防止他们闹事，明朝一边在河州驻军，一边推行了“以茶换马”的经济政策。

二、“以茶换马”怎么管？对百姓公平吗？

“以茶换马”的政策，从1372年开始，一直持续到1735年，前后足足延续了三百六十多年。

当时有一些专门负责给官府养马、换茶叶的番族，他们大多是住在临夏南部和青海东部的藏族、撒拉族人。他们定期向官府交马，官府就用茶叶跟他们换，而且这个买卖只准官府做，私人不能插手，违者重罚。

为了保障这些番族的利益，明朝在1394年还给一些大族发放了“金牌信符”，相当于官方认可的凭证。有了这个牌子，他们就能通过河州的茶马司进行茶叶换马的贸易。这些番族的首领很多还被封为国师、禅师、千户、百户等官职，可以世袭，在当地很有势力。他们的职责主要是两样：一是定期向朝廷进贡，主要是马匹和土特产；二是平时守好关口，有战事时带兵出征，马匹、武器自己准备。

虽然制度上照顾了这些番族的首领，可普通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。当时马匹分三等，上等马最多能换120斤茶叶，下等马最低只换20斤。通常情况是：上等马换80斤，中等马换60斤，下等马换40斤甚至更少。到了清朝，马价稍微高了一点，平均一匹马换80斤茶，而明朝平均只换40斤左右。这种“茶贵马贱”的交换，说白了就是对番族百姓的剥削。再加上运茶的路上到处设关卡收费，层层盘剥，很多百姓实在负担不起，只好逃跑，当地畜牧业也受到了很大影响。

史料记载，明初河州有57个番族负责换马，到明末剩下29个，直到1703年只剩19个。可见很多部落要么合并了，要么逃亡了，要被取消资格。

回看这三百多年的“以茶换马”制度，表面上是中原与边疆互通有无的买卖，背后却牵动着无数番族百姓的生计。朝廷用茶叶换来了战马，稳住了边疆，可那些养马交马的普通人家，却在“茶贵马贱”的盘剥中艰难度日。制度的兴衰，最终都落在一个个族群的命运上。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，究竟有哪些番族承担着纳马换茶的重任？他们分布在哪里，后来又去了哪里？

三、河州“换马”的番族有哪些？

史料记载不太一样，有的说26个，有的说29个。根据清朝康熙年间的《河州志》，明代可考的有十九族。这些族有的住在今天的甘肃临夏县、和政县、积石山县，有的住在青海民和县、循化县、夏河县等地。其中有几个较重要的，比如珍珠族和打刺族。珍珠族住在今天临夏县韩集镇一带，打刺族住在麻尼寺沟乡附近。珍珠族的始祖在1373年带着族人归顺明朝，后来因为换马有功，被赐了官职，世代承袭，这就是韩姓土司的起源。他们家族分两脉，一脉管行政，一脉管宗教，一直管到清朝。民国二十年，也就是1931年，废除土司制度后，这个家族逐渐汉化，韩集镇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。

还有弘化族和灵藏族。这两族住在青海民和县马营镇一带。明朝永乐年间，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一位高僧进京路过这里，建了两座寺庙，弘化寺和灵藏寺。这两族就归这两座寺管，首领被封为国师、禅师，世代管人，管换马。后来清朝平定青海叛乱后，收回了他们的印信公章，革除了名号，但当地人还是习惯叫他们国师、禅师。这一带后来划归了循化县、民和县管辖。

接下来是乧藏族等六族。这六族住在今天积石山县的大部分乡镇，和汉人混居。他们归住在乧藏的王土司管辖。王土司的祖先在1370年被招降后，被安排在当地当“抚番头目”。1552年朝廷发了金牌，让他统管乧藏、红崖等六族，负责换马。这个家族从明朝一直传到民国，传了十多代，前后560多年。1931年废除土司后，他们被编入民籍，产业被地方军阀吞并，也逐渐融入了汉族。

再着是沙马族等五族。沙马族首领在明朝初年归顺，被安排在河州沙马里，也就是今天的和政县南，负责换马，还兼管牙塘族。到了明代中期，沙马族的土司迁到今天的康乐县苏集镇，建了土司城，又兼并了附近3个族。可惜到了清朝雍正年间，因为官司纠纷，这五族被河州卫除了名。除了上面这些，还有撒拉族。他们住在青海循化县，是从中亚迁来的民族。他们的始祖在元朝就当官，1370年归顺明朝，后来被任命为世袭百户，每年向朝廷纳马换茶。清朝沿用明朝制度，直到1896年被废除土司制，这个家族共传了19代，延续了523年。

另外还有老鸦族，因住在老鸦关得名；向化族，住在今天的甘肃夏河县，后来改名叫“南番二十一寨”；川撒族，住在今天的和政县新营乡一带，后来在地方志里就找不到记载了。

四、为什么这些“换马番族”越来越少？

从明初的二十多族，到明末清初的十九族，再到后来只剩几个，这换马的番族怎么就越变越少了呢？原因主要有这么几个。

第一个原因，名字叫法不同。很多族名是从藏语音译过来的，不同时期、不同人写出来不一样，很可能同一个族被记成了不同的名字。

第二个原因，部落迁徙合并。有些部落因为放牧需要，不断搬家，分分合合。

第三个原因，负担太重，纷纷逃亡。明朝中期以后，朝廷要的马越来越多，给的茶越来越少，百姓受不了，有的跑了，有的躲起来了。

第四个原因，内部兼并。大族吞并小族，也是常有的事。

到了清朝雍正年间，平定了青海叛乱后，朝廷直接撤销了“以茶换马”政策，转而在藏族地区设立官府管理。后来推行“改土归流”，也就是废除土司世袭，改由朝廷派官，这些番族大多数也就逐渐被周围的汉族、回族等民族同化了。

回望这段三百多年的历史，河州这些“换马番族”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，成功扮演了自己的角色。他们既为朝廷尽了义务，也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，同时在汉族和藏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